朱山坡《蛋鎮電影院》承載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

在曾經物質匱乏的年代裡，看電影幾乎是中國人唯一的精神生活，也是少有的讓中國人放下重擔、內心舒緩的公共場合。著名作家朱山坡通過《蛋鎮電影院》將「那代人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首次以小說的形式呈現出來。日前，朱山坡作客鄭州松社書店，講述上世紀80年代電影院中的眾生百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通訊員 邵鮮艷

■朱山坡講述電影對自己的藝術啓蒙。

這本《蛋鎮電影院》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書寫了17個相互關聯的故事，均以南方小鎮——蛋鎮的電影院為背景和載體。結構鬆散，每篇拿出來可以獨立成章，同時主題集中，某些人物貫穿到尾，也可以說是一部長篇小說。

朱山坡是廣西北流市人，以村名「朱山坡」為自己的筆名，本名龍琨，現供職廣西作家協會，出版有長篇小說《懦夫傳》、《馬強壯精神自傳》、《風暴預警期》，小說集《把世界分成兩半》、《餵飽兩匹馬》、《中國銀行》、《靈魂課》、《十三個父親》、《驢打滾》等，被評論家喻為「靈魂捕手」。

電影點燃文學之夢

在鄉村裡長大的他，小時候經常放牛砍柴，物質匱乏的童年生活裡看電影是他最大的幸福，電影在他的童年記憶中佔據着至關重要的一隅。

「電影對我影響太大了，於我而言是藝術的啟蒙。」小時候朱山坡很少能接觸到文學類的名著，露天電影是唯一的精神生活。逢年過節放映電影時，在山上放牛砍柴的他，即便柴還沒砍夠，也會趕着太陽下山之前回家，「經常翻山越嶺，以奔跑的速度去看電影」。

15歲那年，根據川端康成小說改編，由山口百惠主演的電影《伊豆的舞女》是朱山坡的文學啟蒙，點燃了他的文學之夢。回憶起當時看電影的場景、過程與感受，他至今記憶猶新，這部電影對他的影響是畢生的。「如此朦朧朧朧的美好的愛情，讓我怦然心動。從那時起，我就想成為一個作家，也要編出那麼好的故事，讓觀眾喜歡。」直到現在，這部電影以及原著小說他每年都要從頭看一遍。

■朱山坡講述《蛋鎮電影院》創作背後的故事。

朱山坡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的電影院承擔着很多不同的功能，既是政府會場又是學校禮堂，看一場電影要等很久，同時設備也很簡陋，熒幕很小，音響也不好。設備經常故障，停電斷片常常發生，焦急而又期待地等待維修，但往往是數小時後滿懷遺憾地離開。「那時的電影院吵鬧、爆滿。門口、走廊、窗台邊全都擠着大汗淋漓的人，聚集着各色人等，有人打架，有人抽煙，嗑瓜子的，甚至耍流氓的全都有。有一次還有個賣雞的小販，電影放映時還有雞叫聲此起彼伏……」朱山坡稱自己是個懷舊的人，在回憶這些場景時，他難掩懷念，眼裡閃爍着光芒，寥寥數語把我們都拉回到了那個瀰漫着汗味的電影院。

「電影院是小鎮的中心。我以為電影院會一直聳立在那裡，從沒有想過有一天它會消失。前些年，我回到家鄉，發現古老的電影院已經蕩然無存，原址和周邊蓋起了超市、傢具店和旅館，大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好像再也不需要電影院。我長嘆一聲，心裡想，必須寫點什麼紀念這座寬大堂皇的灰色房子。」

電影院是人生舞台

「蛋鎮」是朱山坡以家鄉小鎮為藍圖而虛構出來的文學地名，這已經是第二次出現在他的作品裡，在他的長篇小說《風暴預警期》也有「蛋鎮」。處在兩廣交界處的家鄉信息閉塞，小時候迫切想要逃離的故鄉卻使後來的他魂牽夢繞，成為他創作的源泉。

「雞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閉塞但營養豐富，孕育着希望與生命，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會果敢地衝破蛋殼，破殼而出，這裡充滿着無限可能。」在這個虛構的小鎮裡，人們異常閉塞、迷惘、孤獨甚至絕望，每一天都那麼漫長，卻都若無其事地活着。電影緩解他們的焦慮和痛苦，溫暖了他們的內心和夢境，照亮了他們幽暗的生活，乃至慰藉了許多人的一生。

電影院只是個舞台，朱山坡重點來講述那個年代的人和事，展示鎮上居民生活的真實狀態，描摹有趣的靈魂，傳遞人世間意味深長的溫暖、淡淡的憂傷與哀愁。有對愛情的美好嚮往，有對理想主義的禮讚，也有對平淡無聊生活的反抗和對底層人物的悲憫。「在我的小說裡面好像很多美好但荒誕的願望都能實現，在上世紀那個年代，很多單純的人勇敢地做着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個人身上都閃爍着理想主義的光芒，瀰漫着對理想主義的追求。」

寫作這本書時，朱山坡在北師大讀書，住在魯迅文學院，充裕的時間以及安靜的空間給予了他「天時地利」，自己寫作的靈感也常常「從天而降」，「有些東西對作家來說，不表達出來是不行的，關於蛋鎮電影院，我想寫得太多了，從來沒有寫得那麼痛快淋漓過。」

南方的故鄉：多元文化交匯

「一提起南方，很多人的印象就是江浙一帶，但是在南方以南，還有一大片廣袤、潮濕、神秘的土地。那裡植被茂密，在冬天樹也會開花。」朱山坡講述自己的故鄉，靠近那時候發達的香港，又瀕臨越南，受粵港文化、邊境文化、東南亞文化的影響很深，形成了很獨特的文化。

朱山坡的家鄉本來就是講白話，從廣東打工回來的年輕人更給家鄉帶來了標準流利的粵語，「假如上世紀80年代不會講一口流利的粵語都不好意思出門」，其實改變不只是語言，更是思維習慣與當地文化。

深受粵港文化的影響，那時放映的電影也是港片居多，朱山坡對港片還有着特殊的感情。提到港片他倍感親切：「香港電影細節真實，台詞幽默風趣貼近生活，有人文情懷又不乏英雄主義，尤其是人物形象特別親切，而且香港話是真的好聽。」

越戰對廣西也有很強烈的影響，立了一等功凱旋歸來的叔叔，村裡盛大迎接的隆重的程度……越戰給朱山坡的心靈留下很大的震撼，在小說裡也多次取材越戰。

改革開放後，來自陝西、河南的人來到廣西打工，又給廣西帶來了普通話，「剛開始對講普通話的人很排斥，我們擁有着很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思維習慣。不過這些文化的進入都造就了故鄉新奇獨特的文化。」

■電影《伊豆的舞女》是朱山坡的文學啓蒙。 網上圖片

■朱山坡《蛋鎮電影院》。

王斌追憶父親王莘《歌唱祖國》創作背後的故事

著名作曲家王莘創作的《歌唱祖國》已經在幾代人中間激昂傳唱，儘管王莘已去世多年，但這首飽含着對新中國熱愛與深情的歌曲，卻如火炬接力般在中華兒女的心中久久激蕩……

在天津音樂學院的小花園裡，王莘先生的銅像前，記者見到了王莘的兒子王斌。

今年70歲的王斌是新中國的同齡人，漫步在父親曾經學習生活過的校園裡，王斌追憶起和父親切磋談天的舊時光。我們也在王斌的追憶中，了解了更多《歌唱祖國》這首歌曲創作背後的故事。

「1949年我父親參加了開國大典。作為一名音樂工作者，看到天安門廣場上慶祝的場景，他非常激動。當時他就想，如果有一首歌，能讓中華兒女激昂傳唱、表達對新中國的熱愛該多好。從那時起，他就萌生了要創作這樣一首歌曲的想法。」王斌回憶說。

此後一年左右的時間裡，王莘創作了許多首歌曲，但一直沒有一首特別滿意的作品。1950年9月的一天，剛從北京購置了一批樂器的王莘，在返回車站時恰好再次從天安門廣場前經過。「父親對我說，他看到鮮艷的五星紅旗迎着秋風被吹得唰啦唰啦響，少先隊員們敲着軍鼓、唱着歌正在練習隊列，這一幕一下子觸動了他的心弦。」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未加思索，這幾句歌詞就和着曲調一同流淌了出來，「父親當時情不自禁地唱出了聲。」王斌說。

「坐在返回天津的火車上，父親看着窗外的大好景色，聯想到他曾渡過洶湧的黃河長江、也曾長期生活在黃土高原和太行山中，感覺就像跨過、越過了祖國的高山長河一樣。」「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主歌部分在他的腦海中也逐漸清晰起來。《歌唱祖國》最初的雛形，就這樣誕生了。

■王斌講述父親王莘創作背後的故事。

發表受阻 群眾傳唱

「他一到家立刻把這首歌寫下來了，第二天就興沖沖地拿去報社投稿。」王斌回憶道。然而，在流行五聲音階歌曲的當時，這首《歌唱祖國》顯得有點「冷門」，和一封寫着「暫不刊用」的退稿信一起，被編輯退了回來。

雖然發表之路受阻，但王莘並沒有氣餒。他帶着天津音樂工作團，到群眾中間去教歌、去演出。《歌唱祖國》的首位鋼琴演奏者靳凱華至今還記得這首歌曲在天津市耀華中學首演的情景。「最初沒想到這首歌會這麼受歡迎。演完之後，學生、老師們一下全都站起來了，有節奏地給我們熱烈鼓掌，演員們都特別激動。」

首演之後，《歌唱祖國》走進了更多的學校、工廠、碼頭，所到之處，大家的反響都特別熱烈。「父親就想，不發表也沒關係，只要群眾願意唱就行。」1951年9月，《歌唱祖國》終於正式發表，從此響徹了大江南北。在許多重大活動、典禮的現場，總能聽到《歌唱祖國》昂揚的旋律。

▼2005年10月10日，天津市河西區平山道小學的學生們和王莘老人交談。

「我父親從十六七歲起就開始做教歌員，當時是教大家唱抗日救亡歌曲。新中國成立後，教歌這項事業他一直在堅持。」王斌介紹說，父親的個子不高，他就扛上人字梯，站在梯子上指揮；樂譜印不出，他就把譜子寫到小黑板上，挨個音符地教。王莘從人民中間汲取創作靈感，也將藝術作品帶到人民當中，帶領大家歌唱國家的日新月異、繁榮富強。「他在大學的食堂裡、農村的田野裡等很多地方都教過歌，一直到他滿頭白髮了，仍然和大家在一起。」

■2005年，王莘在天津的家中。

在1954年出版的一本刊物上，王莘曾這樣談到《歌唱祖國》的創作：「我常常感覺到，這首歌不是我寫的，而是群眾自己的創作，因為我只是用音符把人民的情感記錄下來。」

王斌凝望着父親的銅像，「雖然父親去了，但相信這首蘊含愛國情懷與民族精神的歌曲一定能一直傳唱下去。」

文、圖：新華社